

以巴衝突的哀思碎語：一個跨學科的默想

郭少棠

緣起：走進歷史的奧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帶來多年的戰爭，戰爭是歷史不可或缺的部份。歷史是人的故事。人是上主創世的部份。上主是奧秘，歷史也是奧秘。在萬事萬物之中尋找常處的存在，又可以在歷史中探索上主的奧秘。拉內 Rahner 稱之為「神聖的奧秘」。神存在於萬物，也在人的故事、人的經驗、人的歷史中找到這份奧秘。認識歷史便是認識神。神是無限者，所以歷史也是無限的經驗積累。人類只能謙卑地關注。更合適的是靈性的凝視，像拉內倡導的「傾注的默觀」和「恩寵的經驗反省」。

人反思歷史，從資料的搜集到文本的詮釋，表面是希望找到歷史事件的源起、現實和未來的影響，實際也是在這奧秘的反思中一種自我滿足的遐想。歷史不論個人或集體的回憶，依舊是不斷地演變和積累。以詮釋學的角度審視處理歷史的描述，對理解爭議性的歷史問題極為重要。

在筆者五十多年比較歷史學習中，中西比較是核心，西亞洲的經歷只是邊緣的延伸。雖然在二十世紀現代世界歷史的教學中，也涉及西亞洲的歷史，但只是從大國角力的外延角度考慮。所以這篇不是一個全面研究以巴衝突的文章，而是筆者默想 2023 年 10 月開始的以巴戰爭的部分體驗，在默想過程中，就人類的苦難，構成歷史迷局的無奈，面對電子媒體活生生、驚心動魄的圖象，忍痛聆聽著人類互相殘殺的悲歌。

百感交雜的歷史情懷

教宗方濟各在《眾位弟兄》中高舉耶穌「誰是你的兄弟」的教導。以巴衝突令人想起曹植的絕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巴本是古代西亞洲閃米特族 Semites 的分支，卻在近百多年因各種歷史潮流的沖洗而沒法成為共存共榮的兄弟國家。

人口遷移是自古至今一個全球性的歷史現象。西亞和北非遊牧民族的重要源流是古閃米特人。至前三千年初，閃米特人按語言明顯地分為東、西兩大支，開始向阿拉伯半島整個地區擴散。東閃米特人生活在兩河流域的北部。西閃米特人分化為許多族體，本身又分為三個分支，其一為西北支，分佈在巴勒斯坦、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各族，最早的代表是阿摩里特人、迦南人、烏加里特人。約在西元前二千年後期，又分化出腓尼基人、猶太人、阿拉米人、莫阿比特人、亞奧迪人等。其二為中支，西元前二千年至西元前一千年，他們的代表是利希亞尼特人、薩姆德人等，隨後統一共稱阿拉伯人。其三為南支。

西元 7 世紀，隨著伊斯蘭教的興起，當時強大的阿拉伯人走出阿拉伯半島，開始了閃米特人的最大一次遷徙和擴散的活動。在西亞散佈到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也門、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埃及、蘇丹、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西撒哈拉和茅利塔尼亞。

猶太人的遠祖是閃米特人支脈，起源於約四千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因躲避自然災害遷徙至埃及尼羅河三角洲東部。但是後來埃及換了掌權者，開始把猶太人當作奴隸，並且驅逐猶太人，猶太人便在西元前 13 世紀末，開始從埃及遷居巴勒斯坦地

區。西元前 11 世紀，猶太人建立了古以色列王國，但後來遭滅國，先後被亞述、巴比倫、波斯、古希臘、羅馬帝國征服。西元 70 年，因猶太人暴動，羅馬帝國將猶太人趕走，並將猶太地改名為巴勒斯坦，開始有非猶太人遷入，猶太人則流落世界各地。

西元 7 世紀，阿拉伯人戰勝東羅馬帝國，開始在巴勒斯坦居住。後來巴勒斯坦地區又被鄂圖曼帝國統治。18 世紀，少數猶太人開始陸續返回到巴勒斯坦地區，購買當時居民的土地，建立自己的莊園。又過了一百多年，少數猶太人開始受到正在冒起的民族主義影響，猶太人復國主義運動因而萌芽，漸漸較多猶太人開始移居和殖民在巴勒斯坦地區。這基本上繼承了歐洲列國在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向世界各地拓展的殖民主義。這個莫大的近代歷史浪潮改造了人類的命運，一直發展了幾百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非（去）殖民地化運動才逐漸減退，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民族建國的縱橫交錯的糾纏中，出現一個與別不同的歷史悲劇。

混雜的歷史洪流與民族鬭爭

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配合著科學革命、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主革命、民族主義和啟蒙思想的浪潮，使不同階段的歐洲帝國主義不斷地塑造全球的政治社會經濟面貌。原來定居在不同國家的猶太人，在這些歷史潮流，尤其民族主義的影響之下，在十九世紀末開始投入民族國家建立的政治運動，與當時定居鄂圖曼帝國巴勒斯坦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開始發生衝突，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透過不斷引入猶太移民、擴展土地的控制，爭取強國的政治和軍事的支持，實踐他們的民族主義建國工程。這項工程從十九世紀末至今仍然繼續而未終斷。

巴勒斯坦人的建國運動，雖然同時進行，但由於西亞以至北非的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情況非常複雜，亦成為當時歐洲強國政治操控和干預的對象，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在鄂圖曼帝國瓦解過程中各種政治的擺佈，在 1917 年外交大臣貝爾福推動的方案，批准戰後的「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

這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支持巴勒斯坦的美國學者如拉什德·哈拉迪 Rashid Khalidi 在他的 2022 年出版的《巴勒斯坦之殤：對抗帝國主義百年反殖民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追溯十九世紀末年猶太復國主義興起與貝爾福宣言的歷史關連，抨擊貝爾福宣言實際是針對成為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像戰爭般的衝擊。

支持猶太建國的學者之中，政治色彩較淡一些的像中國的張倩紅，在她的《以色列史》中指出，「巴爾福宣言發表的時候，巴勒斯坦有近 70 萬阿拉伯人居民，占巴勒斯坦總人口 90% 以上（按哈拉迪書中的數字是 96%），擁有當地土地的 97% 的土地。宣言顯然輕描淡寫地提到「非猶太社團」的利益，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考慮阿拉伯人的處境與困難，為阿以衝突埋下了新的種子。」（頁 153）張氏還道破當時英法兩國都為佔領土耳其在中東屬地，「希望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作為滲透巴勒斯坦的工具」。（頁 152）

其實張氏也客觀地追溯猶太民族在歐洲中世紀至 19 世紀中期在巴勒斯坦地區居住的人數：「自羅馬帝國以來，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阿拉伯人，雖然這裏的猶太人人口從未間斷，但數量很少，16 至 17 世紀，估計有 3000 至四千人左右。17 世紀初期，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開始推舉自己的大拉比，但

土耳其政府直到 1843 年才承認其為猶太社團的官方代言人。1730 年以後，一些猶太學者、商人和手工業者零星遷入，到了 1845 年，猶太人口，大約有 1.2 萬人，……到 1882 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大約為 30 萬，猶太人為 2.4 萬，其中耶路撒冷大約 1.5 萬人，信仰正統猶太教。」（頁 141-2）自始猶太人陸續移民，到了 1914 年，人口達 8.5 萬人，佔巴勒斯坦人口總數的 8%。

以這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建國的中國學者，她的統計充分證明了哈拉迪的分析，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地區，推動的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建國方式。哈拉迪書的英文原著是用「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zation and Resistance」，特別強調「Settler Colonialization」，正式翻譯應為「屯墾者的殖民主義」。以不同方法建立屯區墾地區作為擴張領土，尤其以軍事力量爭奪和鞏固所取得的土地，與 15 世紀的殖民主義的本質分別不大，只是蓋上民族主義的光環。

本文在此特別強調「屯墾者的殖民主義」的論點，一方面希望指出羅馬帝國結束以來，經歷近千年的歷史，猶太民族已脫離了這個地區的實質居住和生活的存在。二三千年的猶太民族在這個地區的經歷實際只是一種歷史遺跡和文化的記憶。從歷史記憶轉化為政治行動背後民族主義的思想系統，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化，把歷史經驗片面而孤立起來，包裝成為政治意識孕育的資源和力量，而忽略了二千年之後整個歷史具體而真實的發展。十年人事幾翻新，何況上千年呢？因為就算在 20 世紀初，貝爾福宣言前後，猶太民族在這個地區仍屬少數。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納粹大屠殺的悲慘情緒波動下，1947 年 11 月，美蘇兩國主導的聯合國通過 181 號決議，要求將巴勒斯坦分為一個大猶太國和一個小阿拉伯國家，並建立一個包括

耶路撒冷在內的國際共同控制的政治單位。但這個決議本身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因為憲章規定民族自決的原則。列強並沒有諮詢佔有大部分土地，而人口亦是佔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和亞拉伯人。這個議決觸發巴勒斯坦和其他亞拉伯人零碎而分散的武力抗爭，結果被剛成立的以色列國家的軍隊打敗。

當時近 190 萬人口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 750,000 人被逐出家園。以色列同時佔領了歷史上巴勒斯坦 78% 以上的土地。結果出現首批大規模巴勒斯坦的難民。

到了 1967 年，以色列先發制人，閃電地打敗了埃及、約旦等國家。在這個所謂「六日戰爭」，以色列吞佔了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六日戰爭導致的平民流離失所，大約有 30 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或被驅逐出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這是第二批大規模的難民。這大批難民要求返回家園，以色列拒絕不談。這是違背聯合國和國際法的原則。

自始以巴衝突不斷，以色列以安全為理由，由 2003 年開始，在約旦河西岸佔領區建立圍牆，全長達 708 公里，圍繞西岸佔領區分界線，所謂綠線 Green Line。圍牆長度是綠線的兩倍多，其中 15% 的長度沿著綠線建成，但其餘 85% 卻偏離綠線，卻在約旦河西岸內延伸 18 公里（11 英里），實際是以色列靜靜地擴闊土地的面積。

2003 年 10 月，聯合國決議宣佈偏離綠線的隔離牆是非法的，應該被拆除，但被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2004 年 5 月，聯合國通過安理會決議，重申以色列作為佔領國，有義務嚴格遵守《日內瓦第四公約》規定的法律義務和責任，並呼籲以色列應該在國際法範圍內滿足它要求的安全需要。在聯合國大會特別緊急

會議上，聯合國引用國際法庭的裁決，隔離牆的建造及其相關管理違反了國際法，批評以色列不能依靠自衛權或危急情況，忽視修建隔離牆本身是不合法的。以色列選擇不接受國際法院的管轄權，也不作口頭陳述，而是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重複自己立場的書面回應。

以色列在西岸地區（包括東耶路撒冷）建立和擴大殖民定居點，它同時借機會沒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拆散他們的社區。在這些佔領區，以色列被指控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包括限制行動、拆毀房屋以及建立和擴大以色列殖民定居點，根據國際法，這些定居點是非法的。但以色列仍然以國家安全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威脅為理由，對國際批評置之不理。

至於加沙地帶，以色列軍隊在 2005-2006 年暫時封鎖了這個地區。2007 年，在哈馬斯在加沙地帶選舉勝利，以色列對加沙開始實施了無限期封鎖，封鎖一直持續到今天。以色列的理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部隊已經逃離加沙地帶，不能再管理巴勒斯坦人，避免他們攻擊以色列。

較諸約旦河西岸地區，在封鎖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受到更嚴重的限制和打擊。230 萬的人口，生活在擠迫環境，經濟沒法正常發展。巴勒斯坦領土的兩個地區：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貧困標準線定每人每天 6 美元。今年 1 月，加沙約 46% 的失業率，比約旦河西岸的 13%，高出三倍半。人權組織、國際社會代表和法律專業人士，都譴責封鎖是一種集體懲罰形式，違反了國際法，特別是《日內瓦第四公約》。他們認為以色列作為佔領國，必須負上主要責任。

解不脫的民族鬭爭死結

在這個歷史洪流捲起的以巴民族鬭爭，其中一些重要的爭論議題包括：

第一個問題，以色列認為這次戰爭是由哈馬斯恐怖襲擊所引發的，以色列只是作出防衛，這是它保護國家安全的戰爭行動。哈馬斯是恐怖主義者，像其他恐怖主義組織，必須被徹底消滅。

反對這種說法的人則說，哈馬斯的恐怖行動是源於過去一百年，尤其 1948 年以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這個地區的種種衝突，正正是巴勒斯坦人幾十年受到的痛苦的一種回應。所以聯合國秘書長在戰爭爆發初期，已經指出哈馬斯的暴力行為，是有它的歷史背景。

第二個問題，以色列嘗試把哈馬斯襲擊行動，作為一個孤立事件去處理，把它與過去幾十年自己在巴勒斯坦地區的行為分開，好像公孫龍子白馬非馬的思辯。哈馬斯的恐怖行動，整個事件背後千絲萬縷的歷史經驗，認為戰爭必然帶來傷亡。以色列轟炸加沙和在約旦河西部佔領區的各種襲擊巴勒斯坦人所帶來的，是一種所謂「附帶性的傷亡」collateral casualty。因為哈馬斯利用平民作為人盾，掩護自己，所以攻擊哈馬斯所帶出的附帶傷亡，是無法避免的。此外，以色列又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例子，各國互相爆炸對方的城市，許多平民都有傷亡。

反對這種說法的人則回應，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首次的全面性戰爭，英文所謂 total war，因為相關的國家，全國全民都投入戰爭，整個國家和社會都陷入戰爭的狀態，所有國民實際都直接參與戰爭。但今次以色列連同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以先進的武器全面轟炸加沙，又用軍隊襲擊約旦河西部地區的巴勒斯坦人。在

二百萬加沙人口之中，真正屬於哈馬斯軍隊的只佔極少數，其他平民都是手無寸鐵的，他們不斷逃避戰爭，並沒有真正參加戰爭。

第三個問題，以色列和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標籤任何反對以色列行動的言行，都是屬於反猶太 anti-Jewish、「反閃主義」（anti-semitic）或者「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t），指責這些言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反猶太思想的延續。

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則認為，他們反對的是以色列政府所代表的極端錫安復國主義。因為這些政治運動，要求把所有「非猶太人」驅除出巴勒斯坦地區之外。當然他們也承認，亦有少數巴勒斯坦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要求把所有以色列人驅除出巴勒斯坦地區以外。這兩種極端思想既不實際，也不合乎兩個民族、兩個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但過去多年的以色列政府一直受到極端錫安建國主義的力量影響，而且得到在其他西方國家中，擁有相類似意識形態的人士的支持，令到和平沒法實現。

著名美籍猶太裔猶太宗學者馬克·艾里斯 Marc Ellis 提倡解放猶太教神學，強烈批評自己民族的極端主義和思想。「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記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脅甚至攻擊巴勒斯坦的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遠離煙硝：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頁3）納粹大屠殺的猶太記憶連同宗教一樣，「在暴力的循環中，宗教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為政治上的主張或反主張背書。……一如當社會軍事化的時候，宗教會助長軍事化的過程。」（頁99）

相對沒有什麼明顯政治取向的澳洲歷史學者畢格頓 Ian Bickerton 作出一個更全面的分析，感嘆以巴衝突的死結。第一，一方面巴勒斯坦希望建立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非常關注的安全問題。第二，以色列過去幾十年發展的殖民政策，在廣泛巴勒斯坦人的地區內，建立他們的定居地區，實際製造了很多矛盾。第三，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須得到解決，尤其由於近二十多年，以色列的殖民和城市發展，令到這個問題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解決。第四，在世界各地巴勒斯坦的難民和他們的後裔，如何能夠返回自己的國家，尤其返回在 1948 年之後他們失去的家園和土地，這個所謂「回歸權」的問題。（Ian Bickerton & Carla Klausner, A History of the Arab-Isareli Conflict）

生靈塗炭 青天何在

上文提及美裔猶太神學家艾里斯在 2004 年沉重地追溯自己作為猶太人的反省（該書的原名），他感慨地指出後大屠殺時代的猶太記憶已被扭曲和極端化，悲劇地塑造成一個歷史的弔詭：「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的援手。」（頁 3）如果他看到今天加沙的慘況，他會有什麼更深刻的回應？

問題是為什麼以色列持續以美國先進的武器猛烈摧毀加沙地區，甚至用地氫式轟炸的方法，可以說是玉石俱焚。摧毀了這些土地，就能夠達到保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嗎？死傷人數不斷增加之餘，到處流亡的逃避戰火的一百多萬人，生活在饑餓的邊緣，承受疾病的折磨，甚至受到疫情的威脅。在臨時的難民營，大概 400 人會輪流使用一個臨時洗手間。在受炮火威脅的醫院，孕婦冒著

生命危險誕下嬰兒。被槍炮打傷肢體的，可能需要在缺乏麻醉藥的護理下，接受截肢的手術。

2023 年底南非向聯合國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投訴以色列有可能犯了「防止及懲罰種族滅絕罪公約」的戰爭行為，請求法庭頒令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以色列當然強烈否認和反駁。經過 1 月 11 和 12 日的公開聆訊之後，在短短兩個星期之後的 1 月 26 日，國際法庭宣佈它的判決。判決報告的第三個部份非常簡單，法庭基於表面的證據，確立南非提出訴訟的法律地位。

報告第四部份，法庭要決定以色列的行為是否「有可能」涉及種族滅絕的行為。法庭引用了聯合國相關團體提供的數字和證據，包括直至當時的統計，25,700 人死亡，超過 63,000 人受傷，360,000 房屋被摧毀。

法庭進一步列舉了以色列國防部長、總統、能源部長及其他高層官員，曾經發表的相關言論，引證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種族歧視委員會的判斷，認為這些官員發表的論述，明顯有種族滅絕和非人性化的意思。

法庭的結論是，認為已經有足夠的事實和處境的證據，證明部份南非尋求的權益的保障是 plausible，「似乎合乎事實的」或「似乎有情理的」。

法庭重申 1952 年，聯合國補充種族滅絕罪公約時強調：這個公約「明確地接納一個純粹人道主義和促進文明的目的，因為它的對象一方面需要保障某一個羣體的生存，而另外一方面需要肯定地支援那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則。」

國際法庭的裁判對以色列政府的軍事行動沒有實質的影響，因為甚至聯合國大會以至安全理事會的議決都沒法制止這些行動。

2024 年 5 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以涉嫌犯下戰爭罪為由，尋求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加蘭特，以及對辛瓦爾等 3 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領導人的逮捕令。

首席檢察官卡恩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雙方至少從去年 10 月 7 日起，都對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負有刑事責任。卡恩指控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引發大規模殺戮、造成飢餓以此作為戰爭手段，包括拒絕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並在衝突中故意針對平民。卡恩對哈馬斯領導人提出的指控，就包括大規模殺戮、犯下謀殺、劫持人質、強姦等。

不論國際法庭或國際刑事法院的裁決，實際沒法完整地道出加沙地區經歷炮火摧毀的社會現況。加沙和巴勒斯坦的學術界、知識界現在所遭受的損失和悲劇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以色列正大力摧毀加沙地帶的社會基礎，包括他們的教育系統和文化機構。加沙著名的大奧瑪里清真寺被炮火摧毀，這座建築物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現在已變成廢墟。但實際上，在過去 2021 年以色列空襲加沙的時候，已經摧毀了不少很有歷史性的古蹟和文物。

巴勒斯坦的學術界、知識界認為這是一場消滅、連根拔起和大規模毀滅的種族滅絕戰爭。他們也正在哀悼這一個他們所知道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已經不復存在，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全世界注視眼光之下，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 21 世紀最大規模的轟炸行動之一。在伊斯蘭大學還有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文學家和學者 Refaat Alareer 阿拉雷爾--雷法特。他任教英國文學，專門研究莎士

比亞，也是一位作家和詩人。阿拉雷爾亦在最近和他的家人一起被炸死。他的學生直接而悲傷地問著：「這種事件怎麼可能接受呢？這些事件是怎麼能夠允許發生的呢？」

國際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的表態不受尊重，令國際公義受到更大的挑戰。實際這次加沙戰爭帶給世人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全球透過電子媒體每天目睹人類慘痛的遭遇，會感嘆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在強權政治的控制和利益擺佈下，能否受到尊重？政治影響之下的訊息傳播往往扭曲或誤導，成為意識形態鬭爭的工具。歷史可以被誤用，文化傳統更淪為意識形態的武器。自以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卻陷入非理性的自我摧殘的悲劇。我們沒法參透歷史的奧秘之餘怎能不懺悔呢？

或許我們應該懷念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套用席勒《歡樂頌》的詩篇，譜成排山倒海而充滿激情的合唱：「歡樂，歡樂，歡樂女神聖潔美麗，燦爛光輝照大地我們心中充滿熱情，來到你的聖殿裡。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分歧。……在你仁慈感召下面人們團結成兄弟。億萬人民互相擁抱！整個世界都是愛！兄弟，在那燦爛星空一位仁愛上帝一定存在。」

（鳴謝：筆者自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曾在《灼見名家》發表九輯以巴戰爭視頻專題講座。本人有若干部份內容選輯自該系列講座，特此致意。）